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中传统文化转型的辩证规律

■ 张连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运动,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考察并把握这一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体,蕴含着中国式道路与现代化方向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征和独特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则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要符合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普遍逻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割裂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仅从道路理解,混同于“中国模式论”,就会迷失方向;仅从方向理解,混同于“西方现代化”,就会丧失主体性和民族特色,都背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传统与现代矛盾的对立。传统代表一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文化传承和历史积淀,价值趋向于保守;现代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方向,价值趋向于变革。在历史悠久、传统厚重的国度,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往往被极端化:一方面,认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完美无缺,凡是传统文化没有的,都被当作“非我族类”的东西加以排斥,走上反现代化的极端民族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认为抛弃传统就可以创造出最新最美的现代文明,走上民族虚无主义的道路。要么以传统反现代,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拒绝进步;要么以现代反传统,生存活剥、照抄照搬、脱离实际。两者都流于思想懒惰和认识肤浅,无法完成本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传统与现代矛盾的统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观点看,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共处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统一体中,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失去传统,就无所谓现代化;离开现代化,也无所谓传统。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传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就成为中华现代文明的一部分;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将成为中华现代文明新传统。

其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并非像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理解的那么紧张。包容多元的现代文明,是能够包容传统的,要废止或改革的仅仅是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部分;而传统特别是其中的非人道、非理性成分,却往往包容不下多元化的现代,因为它们与现代人文精神不相容。因此现代往往被传统中的非理性因素强烈排斥。不打破这些传统中的非理性禁忌和迷信,现代化转型就不可能成功。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冲突也在所难免。因此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容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文明新形态,包容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中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

辩证的否定观认为,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只有经过否定,旧事物才能向新事物转变,并在新的水平上实现自我肯定。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现代化转型,也要经过辩证的否定这一环节才能实现。辩证的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实质上是扬弃,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中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积极因素。

肯定:传承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的文化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对中国现代化这一课题的把握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达到一个新水平。在明确中国式现

代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彰显了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自主性、内生性的特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有助于现代化主体历史主动性的高度自觉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走出被动模仿、片面赶超的歧途。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文化交流互鉴,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文化移植离不开本土文化土壤的滋养,文化嫁接离不开本土文化母本的哺育。

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仅仅传承与弘扬,并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创造出中华现代文明。只有经过否定,旧事物才能向新事物转变。从现代化的高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切实进行文化自省,正视不足,才能找到转化与发展的着力点。

从文化形态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现代文化则是工业化基础上的商业文明。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伦理文化,带有明显的人身依附特征——对土地、家长、权力的依附;现代文化则是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契约法治文化。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进步运动,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之间有着本质规定性的差距。

从现代化的高度看,权力失控与权利不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短板。发轫于农业伦理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人一生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的义务世界,义务观念特别发达,而权利观念却未得到充分发育。宗法社会的财产权以家庭为单位,没有实现财产权个体化,无以发挥权利启蒙的作用。权利、权利主体、人格、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现代文明的文化观念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发育出来。政治关系伦理化,家国一体,移孝为忠,家长制侵入政治生活,形成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公共权力无从制约,公平公正的社会关系也无法形成。

受文化形态和发展阶段所限,中国传统文化,即使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自然而然适应现代化社会、成为现代文化,而必须经历一个吐故纳新的转化过程,实现现代化转型这一质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一肯定环节固然重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否定环节更为重要,唯有辩证否定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要侧重于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思想观念、道德理想,与现代社会相去不远,完全可以打通二者之间的联系,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现代化转型。如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主义,实现民本到民主的转化;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己权界,实现推己及人到自由的转化;从“责任对等,责备贤者”的担当精神,实现人治到法治的转化;从“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仁义道德,实现爱亲到博爱的转化;从“不为已甚,中庸之道”的无过无不及,实现极端到节制的转化;从“反身而诚,知行合一”的反求诸己,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转化等等。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的现代文化元素,要侧重于创新性发展,以填补空白,补齐短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文明弱项,如权利不张、权力失控等,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建设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平衡的现代文化。当然对外来文明成果不能照抄照搬,需要与我国实际、与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相结合,进行创新性发展。只要不人为干预、扭曲市场,市场的力量足以把人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实现社会关系契约化,特别是政治关系契约化、法治化,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驯化,建立起均衡和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彻底打破历史周期率的魔咒。

二次否定:中华现代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肯定。

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第一次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实现第二次否定——

现代化转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成功之日,就是中华现代文明建成之时。中国文化将在新的水平上实现自我肯定。首先,创造中华文化新生命、新辉煌。中华现代文明是扬弃传统文化、经过吐故纳新而产生的中国文化新生命,赓续的仍然是中华文明的血脉,是传统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以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继承学习其成功经验等积极因素,否定其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等消极因素,走出一条独具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再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以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质量互变规律认为,事物运动发展过程呈现量变和质变两种基本状态并相互转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量变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与空间。量变和质变交替循环,推动事物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质量互变规律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具有渐进性和飞跃性两个特征:

渐进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要重视量的积累,不可急于求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质变条件成熟之前,要耐心细致地做好量变的积累这一基础性工作,为质变做好准备。细大不捐,即使细微的进步也值得追求、肯定和珍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量变有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转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转化成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走出宗法身份社会的认知,弱化身份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逐步确立契约性社会关系;走出官本位社会,弱化权力的决定性作用,确立均衡的政治权力责任关系,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都需要耐心地培植、浸润和化育,这必然是一个洗心革面甚至痛改前非的痛苦过程。要保持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迷失现代化方向。在量的积累完成之前,要注意发展的阶段性,推动质变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新的制度可能因得不到文化基础的支持,而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制度摆设。再者,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不可拔苗助长、过度干预,以免拔薪救火,事与愿违。

飞跃性:对发展成熟的领域要及时推动质变,巩固量变成果。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把握机遇,不失时机地推动实现现代化转型,实现新飞跃。局部性、阶段性的现代化质变,既可以巩固传统文化在该领域现代化转型的量变成果,又可以与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量变成果形成良性互动,相辅相成。随着现代性量的积累和局部质变越来越多,现代化道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顺。在全面现代化转型实现之前,不同领域的发展往往存在不平衡、不同步的情况,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价值观、制度安排、生活方式之间往往出现激烈冲突,甚至撕裂社会,造成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各种风险和危机。如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进程因转型不及时而葬送于霍梅尼革命就是深刻的教训。因此,及时将局部现代化进程推向新阶段,不失时机地实现质变,不仅可以保证量变的现代化成果不被逆转,而且可以在新的高度化解风险和危机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最终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迎来全面质变的新飞跃,实现传统文化的全面现代化转型。

总之,辩证法三大规律,对我国现阶段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中华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只要锚定现代化目标,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充满生命力,不断吐故纳新,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华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中共聊城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以及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遵义会议之前的多次严重挫折的深刻总结,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新的内容。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简单机械地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它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列宁曾指出,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现实,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它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 and 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大地,成为我们党推动中国伟大历史变革的行动指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融通性与契合性密不可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其成为党长期执政的思想资源。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应用而不自觉的价值观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

正确理解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继续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作者单位:中共平阴区委党校)

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格局和境界

■ 曹秀伟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彰显出高远的格局境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开放包容文化心态,坚持胸怀天下,担当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化使命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核心是“为了谁”,人民至上的立场确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得高”。中国在文化交往中始终关注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需求。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让世界人民共享我们文化发展的成果,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人民的文化期待,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使命担当。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前提是“本领硬”,自信自立的基本原则确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得住”。坚持胸怀天下的核心要求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这是我们以天下胸怀,审视全球和人类发展大势得出的历史结论和深刻反思。但独立自主不意味着盲目自大、故步自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到底还是文化与文明的复兴,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形成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才能确立起“以我为主”的精神气象,唯其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在世界文明激荡中凝聚起更蓬勃的力量。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我们才不会盲从,才能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关键是要有“大度量”,守正创新的基本方向确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走得稳”。这种大度量要求树立世界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中华文明是包容的,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汲取营养,保持

旺盛的生命活力。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始终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宽广胸怀、理解和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本质是要有“大智慧”,问题导向的出发点确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谋得实”。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为解决人类面临的与文明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从问题意识出发,在新时代世界逆流涌动下深度审视世界之问、文明之问,面对“文明向何处去”“文明如何交流”等问题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担当。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保证是“大手笔”,系统观的科学研究确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干得好”。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坚持胸怀天下的格局境界,运用系统观念从整体上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大势、洞察人类文明进步潮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中看待我们文化发展繁荣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从战略上运用系统思维做好全局性谋划,从大局看问题,在大局下行动才能确保我们在文明激荡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握住文化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中共聊城市委党校,本文系2023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NDZD2023014)〕